

李涛 | 社会工作的耕耘者和思考者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工教育、有效公益

访谈文字记录

01 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是什么？

Q 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是什么？例如，社工和公益行业从业人员，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李涛

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都关注社会有需要的、困难的人群，很多工作是交叉的、甚至是相互包容的，但是社会工作有自己的伦理要求、专业理念、专业方法、专业服务体系。社会工作就是从慈善领域的实践当中诞生的，19世纪末期，美国的慈善组织、会社发现如果没有一些方法、理论、技巧，只是靠热情去帮助别人，服务的质量是没有办法保证的。于是，他们在纽约举办了一个慈善夜校，开展了六个星期左右的封闭式学习，这个慈善夜校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前身，社会工作也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专门的、实践应用的学科。社会工作又被称为“科学的慈善”，接受了社会工作实践应用学科训练并投身到一线服务当中，就形成了从教育到实务以及研究这样一套完整的社会工作服务的体系。

“社会工作”和“公益”的第一个区别在于，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一个人要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之后，才可以作为“社会工作者”去执业。

第二个区别在于，社会工作有服务标准、知识标准和最重要的职业规范的伦理标准，而公益慈善领域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伦理规范。目前，我国已有民政部发布的《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指引》，但还处在比较宽泛的阶段，距离香港地区、美国、英国等国非常完善的社会工作职业伦理守则还有一些距离。

第三个区别在于，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公益慈善服务时必须严格地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专业的服务方法和技巧来开展服务。社会工作者的理念，包括尽所能地去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与公益慈善的理念是吻合的。但是，社会工作理念还要

求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时候，遵循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助人自助建立在三个基本信念的基础上：第一，相信服务对象是有潜能的、有能力的；第二，相信服务对象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第三，相信每个服务对象都是有独特性的，要对他们采取差别性的平等。

第四个区别在于，社会工作有一套社会工作的标准通用过程，而一般的公益慈善项目来说，需求和过程的评估不是硬性要求。所有的服务，无论是面对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社会的；无论是项目还是个案，都必须遵循预估、需求的评估、方案的设计、干预、结案评估等一整套流程。

第五个区别在于，社会工作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服务管理体系，尤其是专门的督导支持体系。社会工作者要定期接受督导，当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和挑战，例如来自于职业的倦怠、情感上的缺失、还有技术方法的难题等，都可以向督导提出申请；当机构发现社会工作者需要有一定的督导支持的时候，督导也会主动跟进。督导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领导谈话、帮助，督导同样有一套伦理规范和流程，例如，督导会为督导对象保密，并全身心地站在督导对象的角度上去理解他，给他情感和技术的支持。

Q 很多公益组织的员工不一定是社会工作专业的背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员工需要去学习这一套社工的专业方法或者专业理论吗？用什么方式来将您提到的“科学的慈善”带入到日常的公益项目运作和机构运作中呢？

李涛

所有跟社会服务相关的公益慈善领域的从业者，其实都有必要学习社会工作专业，这可以从理论上、方法上、理念上保障我们的服务质量。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从在用人时重视受过社会工作训练的工作人员。接受过社会工作训练的工作人员，掌握保密、尊重、接纳、同理心等一些基本的伦理原则，他的价值观跟公益慈善是高度吻合的，社会组织在管理成本上会极大的降低。

受过社会工作训练的工作人员聚焦于为人的服务。社会工作是一个多学科整合起来的专业，吸取了社会学、经济学、发展学、心理学等的知识。

社会学是对社会问题和现象的研究，它要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发生了什么。社会工作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纳入到社会工作研究当中，并且在此基础上强调如何解决问题。

心理学这些年注重从心理社会的角度去开展咨询服务。社会工作者一方面要吸收心理咨询从案主本身的改变来做一些努力的这种个案、微观的角度，同时还要把案主放在（社会）环境当中去，用系统视角去看这个案主的问题，以及家庭环境、社区、同伴的交往对案主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考虑社会文化和政策是否存在着不公正、不公平以及对边缘群体没有惠及到的地带，并展开相应的政策倡导。

同样的，受过社会工作训练的工作人员有助于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社会工作里有专门的方法叫“社会工作行政”，它包括对组织的规划治理、组织协调、计划实施、监测评估等一整套流程，它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社会工作行政这个方法，让一个组织有效地把它的政策、理念转化成服务行动，从而为这套服务行动提供保障。

所以社会组织有责任而且有必要自觉的学习社会工作、应用社会工作。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公益慈善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科学公益、科学慈善当中去，成为一个完备的、专业的服务体系。

02 社工教育/发展 (22:48-46:14)

Q 社会工作是一个实践的学科，它需要大量实践，不断地去磨练技能，不断去熟悉掌握工作方法，作为一家公益组织，要怎么去将这套社会工作的方法融入到机构和员工的管理中？

李涛

现在社会工作的发展都出现了跟实务脱节的问题。社会工作是个应用科学，但我们发现大量取得社会工作证书或（经过）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人的实务能力非常薄弱，主要是社会工作的训练侧重于知识学习、理论学习。现在我国督导队伍、可以实践的专业机构都不够，前些年90%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只能到居委会、事业单位去实习，没有专业的督导，导致社会工作要求的300小时的专业实践落实得质量不佳，导致书本的理论知识转化、和应用到实践的过程没有完成。当然这两年社工机构越来越多，状况好了很多。

另外一个原因是目前还没有针对社会组织的系统的社会工作的学习机会。社会工作的知识大都在大学里面学，民间学习的通道其实是非常窄的，完全靠自学或者参加一些讲座式的学习。那么（只能）大量地就是靠这些学习者自己的运气、毅力、悟性，悟性好，愿意踏踏实实去做，ta就会不断地总结反思自己，形成知识到实践的转化。但这个转化率是很低的。我们也看到这两年高校中社会工作的学位越来越多了，并且这

些项目向社会组织开放，鼓励在社会组织有过实践经验的人再来进行学习。能够带着实践经验、实践问题再去学习理论，这种学习的效果会非常非常得好。

这些年，协作者就在推动一社会工作的大众化教育。2020年9月8号，我们正式启动了“没有围墙的社会工作教育”项目——协作者学堂，专门面向没有学习机会但又想成为社会工作者的弱势青少年，让他们系统地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三年。这些青少年们接受了社会工作的帮助，他们特别希望参与进来但是很难，我们就专门创办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帮助他们。我们希望让社会工作教育走出高校，走到民间。因为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从民间成长起来的。社会工作之母玛丽·里士满，她17岁时外出打工，后因生病回到家乡的一个公益慈善组织做财务助理，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摸索，发现公益慈善一定要走专业化的道路。

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我们重视的，社会工作专业建设非常重要，我们社会组织有更多的责任和策略来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的建设之路。我们社会组织往往特别注重对服务对象的赋权，但是我们忽略了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们们的专业建设也要系统化。

Q 一些从事社会工作的社会组织最近在做“社工站”的工作，这是否是国家层面对于社会工作认识的提高，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了解？

因为您也是首批的社会工作者，一直从事社工领域，在您看来整个社工领域二三十年来的发展和聚焦的重点，包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说经历了哪些阶段？

李涛

1987年的马甸会议上，民政部与北京大学达成协议，由民政部资助北京大学100万元，在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工作专业，这开启了政府和高校“教育先行”的合作模式。此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华女子学院也都恢复了这个专业。

在此基础上，我国社会工作又开始走上了“嵌入式”发展的路线（王思彬老师提出此概念），即社会工作者接触训练后，嵌入到我们现代的行政化服务体系当中去，在行政化的社会福利体系这套模式中逐渐地走向专业化的发展。大量社工进入到福利院、民政事业单位、居委会等单位，北京、上海等地还提出了落户政策来吸引大学生社工，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

2006年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构建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纳入到了国家战略体系当中来”。2008年，国家正式开启首批的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考试，我是当年第一批的中级社工师。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这样的一套制度，社会工作开始逐步在更广泛的人群当中活跃起来，这是一个阶段。我也是参与民政部组织的制定职业资格评价办法的讨论的为数不多的民间组织工作人员之一，当时我们关于社会工作者资格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很多人提出只有大学里受过社会工作训练的人才才有资格考社工师，我们（民间组织）提出：（应当）取消对学历的限制。社会工作是个应用实践的专业，很多没有在大学学习过的人已经在实践中摸索过了，如果一个人愿意考且能够通过考试，就应当认为具备社工师的能力。我还提出：社会工作推动的是向一些保守、僵化的东西挑战，使我们的社会更具开放性和活力，那么社工师的考试也应该如此。尽管我个人反对任何形式的考试，但当下社会考试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尽管大家认同我的部分观点，但作为一个考试，它还是要有些条条框框，因此最后把学历限制降低到了高中，让一部分打工青年、弱势群体等，也有机会参与社工师的考试。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必须要依托在一定的职业平台、服务系统中，社工人才才可以发挥作用。因此，除了居委会、社会福利体系，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也是很重要的一块。但当时社会组织发育非常缓慢，那个时候登记注册相当困难。民政部就委托我们协作者做了“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农民工”的课题研究，其中的一条建议就是：取消“双重管理制度”，让自觉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来开展服务的（社会）组织更方便地去注册，让社会工作者就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他们的才能。不久后，我们又参与了2009年发布的《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文件的起草工作，该文件指出：以社会工作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在注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民政部门应该主动担任它们的业务主管单位。这就意味着取消（对以社会工作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取消双重管理的第一个尝试是从社会工作的发展开始的，这是社会工作的发展给社会组织带来很大的一个贡献。在这个背景下，大量的民办社工机构、社会组织雨后春笋一般地成立了。

当下你谈到了社工站的建设，它的背景与社会工作发展不平衡的这个问题有关。广东作为当时中国社工发展最好的地区，大量的社工机构在深圳、东莞、中山等城市里边，很多贫困落后的山区没有社工机构，很多机构也不愿意去。原因在于，社工机构主要靠政府购买服务而生存，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购买服务的足额资金，这引发了服务成本、留住人才的成本等问题。在脱贫攻坚进入到非常关键的时期，广东省民政厅提出了“双百工程”，由政府出资，在100个乡村来建设社工站招募社工人才，让落后地区也可以享受到社会工作，吸引社会人才服务当地的困难群众。

（广东）很快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开始在全国推广。在全国推广后，建立社工站的目的有所变化：部分地区社会力量和商业力量不愿意去时，政府需要亲自来做；但是全国性的社工站，一定不能走政府自己来建的这条路线。我们提出来一个概念叫“行政

不可以干涉专业”，就是政府不能干预社会组织的运作。政府可以提要求、目标，社会组织可以自行选择方法、策略，政府要对此表示尊重。反过来，专业也不干预行政。行政体系的运作有自己的合法性，社会组织提供支持和倡议，但不乱干预。

如果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边界划分清晰，社会组织与政府就达到了“各有分工、互相补充资源整合”的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工站就会真正的成为一个平台，让社会工作、社会组织在里面发挥专业力量，让政府的行政资源在里边发挥行政力量。这也是目前很多社工站开始公开招标，让社会组织去承接的原因。

关于社工站的建设，我觉得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有更好的政策合作空间，让社工站的建设去带动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学习社会工作知识，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例如，靠政府购买服务资源的引导，社会组织主动地去学习社工、进入社工站做社工。

03 协作者的项目与行动 (46:15-1:00:46)

Q 李老师把社会工作领域的政策的历史变迁，讲得非常清楚。除了社工这个议题，我们也很感兴趣的一个议题就是“流动人口”，这也涉及到老师您自己的个人选择。您最开始是在《中国妇女报》做记者，在此期间接触到了社会工作，后来转行全职做公益。您以社工的方式，和以记者的方式，在和农民工群体交往的过程中，观察到的和感受到的会有什么区别吗？

李涛

作为记者，接触群体更多的是为了搜集信息，想了解发生了什么，找到一些真相。针对一些遭受不公的农民工，是希望通过发声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来帮助农民工，促进问题的解决。但对于这个人未来长期的发展，这个群体该怎么办，农民工群体跟国家、跟社会的关系等，并没有深入的思考，因为那不是记者要去思考的东西。社会工作这个专业会要求我从整个群体的命运、社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包括怎么样去推动社会更好地发展等。

跟农民工群体一方面是处在采访和被采访的职业关系，也有很好的朋友关系，(因为)往往记者都跟他们聊得来。但成为社会工作者后跟农民工的关系是一个专业的、受到伦理保护的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我会全身心地接纳他关注他，但我不能逾越关系的边界。比如我做记者采访过程当中，听到对方给我讲的故事，如果我觉得他做得不好，我当时就可以批评他说“你当时这么做你真糊涂”。但作为社工讲究“非评判”，因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在他那个处境下是我们很难理解的。这种专业的关系会让我们的关系走得更长久，我们的服务更加有效。

Q 公益组织一般都有机构创立的“使命”、“愿景”，我们一直都说一旦一个机构的使命愿景实现了，这家机构也可以消失了。我理解您在做记者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的问题，并通过协作者这样的一个机构去解决您看到的问题。协作者到现在也快20年

了，在这个过程中，您通过了哪些方式、哪些项目、哪些思考，来解决您看到农民工的一些问题呢？

李涛

协作者在成立时候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思考使命、愿景。“愿景”是：通过政策倡导，服务，专业支持，来消除因为地域、职业、性别、文化造成的歧视，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怀抱着尊严和梦想，自由地行走在大地上。这是我们的愿景。后来愿景简化成了一句话：“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行走在大地上”。

要实现这样一个愿景，我们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服务策略。一是服务，首先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尤其是陷入困境的农民工，解决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基本生活、工伤、职业病、拿不到工资、孩子没有办法上学。协作者最初开展了很多这样的救援、维权服务，因为那个年代很多农民工集体讨薪、受到工伤等非常严重的不公平。当然这些年少了一些，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映，这些年我们的农民工（政策体系）还是有发展的，我们的政策在慢慢地完善。另外，我们也针对家庭贫困的农民工开展救助，包括给孩子们助学款等。

例如，我们去年开始关注骑手，发起了“骑手关爱行动”。骑手的交通安全问题，社工的思考是为什么会有大量的骑手牺牲掉安全？我们做了一个调查，访问了300多名骑手，发现导致骑手交通安全的原因，除了平台的算法问题之外，孩子对他们的影响很大。50%多的骑手的孩子是在老家的留守儿童；剩下的40%多的骑手，虽然把孩子带在身边，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整天是见不着孩子。见不到自己孩子，会影响骑手的心情，它当然就会造成很大的交通隐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做大量的赋能的能力建设，培养农民工一种参与的能力，包括运用小组的工作方法，鼓励农民工建立同伴支持网络，我们这个叫“非正式支持”，让这种非正式支持系统可以越来越有力量，共同去面对一些生活的问题。在社区层面，我们鼓励农民工的社区参与，鼓励农民工跟本地的居民融合。我们做了一个“牵手行动”的项目，鼓励本地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和流动儿童互相照顾，在互相照顾的过程当中，发展他们的一种关系，改善社区的邻里关系。在我们的各种服务的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鼓励农民工参与，这也是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决定的。协作者总共服务了大概100多万人，并培养了大概几万个志愿者，其中60%的志愿者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既有流动儿童，也有我们救助过的农民工。协作者工作人员当中也有我们当年服务过的农民工，他们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们开展的第二块工作叫“政策倡导”。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发现，通过服务，农民工的现实紧迫的问题会得到缓解，但是这个群体依然没有办法可持续地发展。比如说农民工的意识觉醒了、能力增长了，但是如果环境不发生改变的话，仍然是非常困难

的。于是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开展行动研究。比如我们在今年的三八节的时候发布了打工妈妈健康报告，打工女性因扮演多重角色压力极大，导致她们的健康被牺牲。这里，“健康”不是个简单的医疗问题，也与大量打工女性因灵活就业无法享受到社保政策、医疗保障政策有关，这（份报告）就变成了一个政策倡议，我们给到有关部门去完善这个政策，这份研究报告帮助我们更有针对性地设计我们的服务。

我们做的第三块服务是“专业支持”，在服务过程当中，我们会总结、提炼服务方法，把这个方法又变成一些技术，分享给更多的本土的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社会组织，让他们更好的去发展。

这样就形成了服务、倡导和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一种干预模式，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整合取向的，系统的一种干预。

Q 您提到服务方法主要是直接服务，从社会组织角度理解即“个案服务”。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非常多，我们现在常说这个没有办法实现“规模化”或者“有效公益”的这种概念。在这个问题上，您是否有过一些实践或者说探索？

李涛

微观的服务跟宏观的改变并不冲突，两者是一体的。如果只去考虑宏观，这个宏观是没有根基的，是虚无缥缈的、形式化的。但如果只局限在微观方面，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鼓励和提倡系统性的服务方法，把微观和宏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于微观之处看到宏观改变的可能，并找到宏观改变的技术和方法。

第一，我觉得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工作机构，都有责任去推动行业的发展。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伦理中包括“对机构负责”、“对服务对象负责”和“对专业负责”。怎么去精进专业，于实践当中去总结提炼方法，丰富理论体系，让这个专业发展更好，这是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责任。因为社会组织不同于商业领域的利益竞争，我们社会组织还是要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所以说，我觉得每一个社会组织，不管是支持型的、服务型的，还是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都是有责任把你的一些服务经验和方法开放出来，让更多的组织去借鉴，去学习。

另外，通过政策倡导完善和丰富政策。我们往往一谈到倡导工作，就觉得带着很强的运动色彩，其实这个并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完全可以找到更专业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组织在一线，更了解服务对象的需要，我们可以通过扎实的社会调查、研究总结提炼，把我们发现的问题更科学、更有说服力、更具有可操作性地提出来。我们国家和政府其实也特别需要这样的一种建设性的意见。协助者曾经推动过几个政策的制定。2011年，民政部出台了《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第一次提出社区有责任为农民工服务。在这个文件出台之前，政策规定公安部门做好暂住人口的管理，劳动部门做好就业做好保障，而没有居委会和社区服务农民工的政策，导致没有社区

为农民工提供服务。这个政策出台后，很多的社区提倡社区融入、社区服务，把流动人口纳入进来，这个政策就对一个群体、一个服务体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04 展望未来 (1:00:47-1:04:40)

Q 近几年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些变化，关于流动人口的政策也有一些调整，李涛老师对协作者未来发展的规划有没有一些调整或者新的想法？

李涛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城市功能（的变化），外来人口数量相对在下降，做这方面服务的社会组织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以历史发展观来看这个问题，会发现这一点不新，在90年代上海等城市里下岗工人的压力非常大，就提出了要纾解农民工，让农民工回到家乡去。城市化的进程，人口流动会不断地出现逆流，今天可能又是一个反复。

但是今天跟过往最大的不同是，城镇化、非农化的转移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国家战略，我们整个社会已经走向了开放，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特大城市如何去完成现代城市治理体系的建构，是需要大家探索的。我觉得有比纾解人口更有效的一些现代城市治理的体系，但我们可能还没有找到。作为社会工作者，并不能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服务。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更专业的服务，找到一些更有效的这种特大城市的治理的方法和经验，推动政府完善城市治理体系。这些年针对流动人口的政府购买服务在减少，很多人也在劝我说就不要再做流动人口相关服务了。但我们协作者不是为了资源而存在的，是为了我们的使命而存在的。（政府）购买和不购买对我们当然有影响，但这不是我们要不要存在的一个目的。恰恰相反，当处在这么关键的转型时期，恰恰需要我们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服务，更好地协助政府完成这样的一个特大城市的治理科学治理的一个转型。

05 社会组织的困境与出路 (1:04:41-1:18:31)

Q 刚刚李涛老师提到很多组织会担心运作经费的问题。做直接服务的社会组织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人力、物力的成本由谁来承担？现在比较多的一个方式就是政府买单、基金会资助、或者其他的资助的方式。您在这个机构运作过程中，资金方面有没有遇到困难？

李涛

这么多年，协作者的服务平均每年大概都有30-40%是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协作者这么一个老牌机构依然这么困难，可以想象其他的组织就更困难了。

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组织的资助体系、购买体系比较单一。前些年政府购买直接服务比较多，这两年政府购买支持型服务比较多。但是资助社会组织做研究、做倡导的项目很少。我刚才讲的“打工妈妈健康报告”，是我们跟企业合作。很多打工妈妈都没做过体检，但体检机构的体检费用是很贵的，我说我好朋友（企业老板）资助200位打工妈妈做体检。要组织这200个打工妈妈去体检是相当费劲的，很多打工妈妈是拒绝体检的：我知道我身体不好，一旦检查出问题，我怎么办？我家庭负担不是更重了吗？所以我不检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慢慢跟她们沟通，同时还要跟企业沟通体检的时间限制，两头不断协调的成本是极其高的。考虑到成千上万打工妈妈的健康问题，我们决定做倡导和研究。我们社工自己设计问卷，准备访谈提纲，在带着妈妈们去体检的时候开始做这个调查，最终这个三万多字的报告是社工志愿完成的。这个报告被《财新》杂志、《中国社工》杂志、杭州的媒体、《新京报》、《中国妇女报》报道，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但是外界不知这个背后是社工用志愿者的方式完成的，没有任何费用的资助，是靠加班、透支个人时间来完成的，很累很辛苦。

这个背后反映出来社会组织的环境极其不健康的问题，我们要反思背后政策层面的问题，即我们购买服务的政策体系怎么去完善？其次这件事情还反应我们的捐赠文化忽略了提供服务的人的重要性，只有让服务者更有力量、更专业，服务才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工比例是3-4%，中国的社工比例是万分之三，社工得不到支持去体面劳动，社会组织得不到支持更好地去做专业，当有一天要求助的时候，社工在哪里？他们不在。我们的企业捐赠文化还忽略了捐赠的本意：任何捐赠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让公益变得更强大。公益慈善是有成本的，一个需要社会组织垫付成本的捐赠，是不道德的捐赠。如同我给朋友送有附加条件的礼物，朋友拿到这个礼物之后内心的压力更大了，那这个礼物发挥了什么作用呢？这不是一个不道德的赠送吗？

Q 公益圈也一直在提“捐赠文化”这个概念，包括公益是有成本的。筹款伦理里面也会提到说不能够向捐赠人去表示我们不要成本，这样去恶性竞争，是违背筹款伦理的。因为我们的义务是要告诉捐赠人做公益是有成本的，从你的捐赠一块钱到受益人的一块钱中间不是没有成本的，这也不是有效公益的发展路径。当然我们看见还是有很多的差距，整个公益行业也一直在提低工资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民政也都一直倡导提高社工的工资，因为工资必然就会吸引人才。李涛老师您关于这个行业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就是改变一下这个情况，您有什么想法？

李涛

一方面，在公益文化的建设上，让公众和一些捐赠方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社会组织需要有工资保障，为什么公益人需要体面劳动。另一方面我一直想呼吁的是改变我们的项目的财务管理模式，加强预算审计，取消结项审计。实践中往往资助方的很大精力在审财务上，至于说服务的质量、效果，反而关注的很少，导致整个公益行业大量的管

理成本放在了财务上，应付各种财务审计做好财务，这是不合理的，也把社会组织的资金灵活性给掐死了。资源灵活限制死了，社会组织最擅长的东西就没了，因为社会工作服务很讲究个案服务的针对性。如果一旦有资金和预算的变动就要向服务方去汇报，就很别扭。至于会不会出现贪污腐败、资金挪用，有年检审计等来保障信息的公开，过于严格的财务审计反而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扭曲的预算反而助长了很多不规范的财务管理。所以我是一直呼吁这个事，“资助”、“捐赠”实际上都是“购买”服务，购买是等价交换。好比你去企业买东西，并不会去审计买东西的钱，企业多少用于发工资多少用于其他项目？当然也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我们公益行业要去大力呼吁的。